

前两天,我家厨房的下水道堵了,打电话请周队长过来疏通,周队长长期服务于小区,大家都跟他相熟,谁家爆了水管房顶漏水什么的都找他。

周队长胖胖的,是个江苏人,四十来岁的外来工,口音还蛮重的。

他跟我家的钟点工小杨也很熟,我家小杨是广西人。他们两个人在厨房倒腾下水道,我在客厅用平板电脑处理事情,听见这两个人在厨房秒变粤语交流,当然都说得非常烂,但是就是坚持说,还说得很高兴。

我是一个语感差的人,在广州呆的时间比他们长,但是我不会说粤语,最大的负担就是怕丑,别人一笑自己就崩溃了,或者不等别人笑自己就觉得干吗要那么丢脸。但其实如果明明知道要在一个地方长期生活,学习当地语言是第一要务吧。

你看周队长和小杨就有这个意识,他们是改革开放时期进城的务工人员,家乡话都是很顽固的,但是他们特别懂得要克服困难适应环境。

我以前总觉得穷人就不可能有什么快乐(当然我也不富所以也不怎么快乐),觉得富人开着游艇或者私人飞机就好开心。

看过电视剧《楼外楼》,对商场的激烈竞争印象深刻,尤其是“老燕京”的不择手段,令人震惊和不齿。然而,这样的竞争在商品社会并不罕见。“行行业业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和特征。工农商学兵和服务业,哪一行没有竞争?产品质量,销售市场,招聘人才,竞聘岗位,工作业绩,行业发展……甚至学生家长之间也有竞争,唯恐自己的子女输在“起跑线”上。两句话:世界无处不竞争,竞争是客观存在。

庄子说“有竟有争”,即“并逐曰竞,对辩曰争”。通俗地说,“竞争”就是“(为一己之利而)相互争胜”。我们这里说的“竞争”,指的是在市场经济中“不使用暴力实现其要求,不通过特权达到其目的”,是“用合法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盈利愿望”。

“竞争”不是个负面词,而是个涉及正能量的“积极词”,因为它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要素。市场经济的“要素链”是:社会需求—市场—利润—竞争—创新发展—社会进步—(新的)社会需求。如此循环往复,没有穷尽。其中“竞争”和“创新”则是推动行业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引擎。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破“大锅饭”,进行公平有序的竞争,才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新力,促进行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经验,就是最有力的佐证。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役中,我国各行各业,尤其是许多小微企业,不畏艰难困苦,积极参与竞争,坚持创新发展,取得了抗疫和生产的双胜利。这种“敢于竞争、乐于竞争和善于竞争”的精神值得点赞和发扬!

以愚见,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或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你追我赶”的竞争。这是公平有序、相互学习和互相促进的良性竞争。这是竞争的至高境界。只有进行这样的公平竞争,才能促进人努力进取,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比如乒乓球比赛的竞争。但社会经济的实践证明,这样的竞争毕竟还不多见。二是“你争我夺”的竞争。这是“急吼吼”的,但还是有良心的竞争,只不过吃相有点难看而已。这是竞争的中级境界,也是市场竞争的常态。好有一比:足球比赛中双方球员的“竞争”,你抢我夺,尤其是比分落后的一方,简直不择手段,除了吃红牌的恶意犯规。三类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这是“只顾盈利,不择手段”“唯我独霸,不让你活(做生意)”的竞争,是扰乱市场、破坏经济秩序的恶性竞争。这是竞争的原始境界。德语中有一个俗语叫做Der Zweck heiligt die Mittel.(字面意思是“目的神化手段”,实际寓意“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恐怕这是这类竞争的真实写照。通过弄虚作假、坑蒙拐骗或耍弄阴谋而赢得竞争,只能得利于一时,最后落得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下场,受到市场和法律的双重惩罚。如果一定要用体育比赛做比喻的话,那么拳击似乎有点可比性:把对手击倒才是赢家(要由裁判根据比赛规则判定)。

至于在生意场上动用暴力,甚至谋财害命等极端手段,那就超越了竞争,是刑事犯罪。记得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上海不法资本家王康年等用未经消毒的烂棉花当药棉卖给志愿军,夺走了许多年轻伤病战士的生命,结果被判枪决刑,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竞争犹如比赛,公平的竞争也需要裁判。市场经济中竞争的裁判就是政府。有政府的监管,才能保证有序的公平竞争,才能使竞争不仅造福竞争者,而且也造福整个社会。惟其如此,才会出现百舸争流、万木争春的生机勃勃的社会市场,才会出现欣欣向荣的公平竞争的大好局面!

但其实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思想负担,没有什么鬼包袱,该怎样就怎样,其实也可以很快活。

周队长在广州买了房子,属于特别有眼光的那种外来工,女儿也从大学毕业了,据他说是双学位。他的名片上印着周队长,大家也都这样叫他,但我看他出出进进永远一个人骑一辆电驴子哪里有什么队伍。

小杨会做一种特别好吃的红烧肉,问她秘方,她说得滔滔不绝头头是道,回家一试全部以失败告终。我觉得她关键的地方省去至少两百字。

不过他们都很快乐,尤其是说粤语的时候。

于是我把这一感想跟一个朋友交流,她想了想说是的,我爸爸从生到死一辈子没有说过一句广州话。她爸爸是在广州工作的浙江人。我们骨子里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居高临下不肯改变的人生态度。

但如果不是为了生存结果就会不一样。

而学习其实是会使人快乐的。

多年前,一天凌晨一时二十五分左右,我下班回家正走在陝西北路上,远远地见到一辆24路电车往南开来。突然之间,一种好奇心让我心生一念,这辆车来得准时吗?于是站在车站,看着车子一步步地进站。车子停下的那一刻,我抬头看看站牌,时间是01:27,和站牌上的时间正好。

没想到,夜宵车竟如此准时,引起我的兴趣。以后的日子,我夜班路过时,时间差不多的话,我总要在站台上看着夜宵车的到来,似乎是在迎接它,也似乎是在验证它是否准时到达。不管是02:07,还是02:47,它都是如约而至。我印象中只有一次,是晚了1分钟。有次乘夜宵车,曾问过一位驾驶员,会不会不准时靠站?他告诉我,不会。因为乘客是算准时间来的。一旦乘不上,要等很长时间,驾驶员宁可晚一分钟到也不会提前,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乘客都能早点回家。

公共交通是城市的命脉。1291年上海设县,此后漫长的数百年间,木船和马车、牛车是人们出行的交通工具。16世纪出现了一种可供人雇用的营运轿子。再后来,出现了黄包车。直到1908年3月5日5时30分,英商从静安寺开出了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中国民族企业家在1913年开通了华界第一条无轨电车线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有公共交通工具900辆,每天载客66万人次。1958年9月,第一条为三班制工人服务的65路夜宵线公交车开通,从此,上海公交全天候24小时运营车辆越来越多,至今已有40多条。

记得第一次参与“上海之春”,我还是在念上音附小的时候。那年我才9岁,刚参加完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的人学考试,那场演出都是由上音附小的学生参加,名为“小小演奏家”。我记得十分清楚,在那场音乐会上,我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钢琴作品《杜姆卡》。

而再一次参与“上海之春”,已是11年后的2013年,作为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学生的我,在第30届“上海之春”上举办了个人作品音乐会。这也是龚天鹏作为“作曲家”在“上海之春”上的首次亮相,由此我和“上海之春”便有了长久的缘分,这些年来,“上海之春”推出了我一部又一部新作,见证了我一次又一次的成长。

2014年我从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回国,从上海爱乐乐团接过聘书,成为乐团首位90后的驻团作曲家。2017年便是由上海爱乐乐团在“上海之春”上首演了我的中提琴协奏曲《麦田里的守望者》和《第六交响曲》。《麦田里的守望者》,灵感来源于塞林格的同名小说,描述16岁少年霍尔顿的内心世界,《第六交响曲》则是讲述了我青春期的叛逆史。

2018年,是我的《第十交响曲》(京剧幻



气场,是近年来颇为流行的一个词语。我手头的第五版《现代汉语词典》对此并无词条释义。网络上的解释是:气场是指一个人的气质对其周围人产生的影响,是对人散发的隐形能量的描述,它反映人能掌握到的自然规律的多少。这样的解释有点玄奥,但又似乎说出了点什么。照我的理解,气场,是指一个人所具有的独特的的气质或魅力对周围的人产生的感染或影响。这在拥有深厚的科学、人文艺术修养的科学家、学者、艺术家中相对多见。

音乐家中有气场者,史料中不乏有趣的记载。比如法国大作曲家柏辽兹,同时是一流的指挥家。有一次,他未经排练就直接指挥了自己的代表作、交响诗《罗马狂欢节》。演

出之前,不管是乐队,还是听众,都对柏辽兹这种有违常规的举动捏了一把汗。但到了演出那天,柏辽兹上场一亮相,人们就发现此类担心纯属多余。只见他在指挥台上站定,目光如炬,对着乐队的每一位演奏员扫视了一遍,仿佛再说:别担心,有我在,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他打出的节拍准确有力,提示到位无误,无可挑剔。未经排练的乐队像被施了魔法,将《罗马狂欢节》演奏得波澜起伏,对比鲜明,高潮迭起。演出获得了圆满成功。

柏辽兹的气场不言而喻。之所以如此,是他因为拥有作曲家和指挥家的双重天赋和才能。用中国人的俗语: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不过,金刚钻究竟是什么?有时还真难说清。

上海城市发展太快,公交需求激增,但在那个特殊的10年中,乘客增长50%,而车辆仅增加13.8%,运能增长17.4%。上世纪后二三十年,公交需求矛盾十分突出,公交车厢一平方米的地方要站11个乘客,就是那时真实的写照。作为过来人,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在上海乘公交车,车站上的乘客越聚越多,但车子左等不右等不来,上班的时间快到了,那个急啊,路近一些的,想想走了,往往心又不甘,一步三回头。如果此时看到车子将要到了,便急忙回头。如果走得远了,往回走又赶不上,赶前一站又不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车子过去。如果看到车子并不十分拥挤,是最为懊悔的,只能自认倒霉。如果碰巧赶上的话,心里则不免小窃喜,似乎赚到了便宜。最难过的,是有事赶路,你伸长了脖子,车子就是没有;当你不急时,车子却一辆接着一辆。那时最常想到的,是唐朝诗人李益的诗句:“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现在,公共交通出行的方式有了极大改变,快捷方便安全的地铁成了人们的第一选择,还有出租车、私家车,人们可以计算着时间出行,再也没有了挤公交的苦恼了。现在不仅夜宵车是准时的,公交车还能在家里通过手机查找到站时间,站牌上也标注着各个车子到站的时间,乘客一目了然,可以悠悠地刷着手机,不必再伸长头颈,翘首以盼地望着车子到来了。

现在,夜宵车准时,白天的车子也准时,这是科技的进步,也是时代的进步。

想》在“上海之春”首演。早在2018年的新春,刚刚重修完工的上海爱乐乐团异常冷清。原因很简单:新家具还在散味。因为马上就要试演自己的第十交响曲,我戏言自己“等不及了,中毒就中毒吧”,窝在行政楼北部的创作室里疯狂创作。值得欣慰的是,首演结束后,尚长荣先生走到后台对我说:“当年

用音乐传递我们的价值观

龚天鹏

倩娘主题在全体铜管和巨大的管风琴声中再次回荡时,我哭了。我真心没想到,没有任何京剧乐器或人声的交响乐能如此传达京剧的灵魂。祝贺你。谢谢你。你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其实,在我回国之后,我音乐中的民族特征加强了许多,可以说我追求的是中国民族音乐元素与后期浪漫派交响乐语汇的结合。

今年的“上海之春”,我带给大家的是交响曲《百年颂》,这是从去年疫情期间就开始创作打磨直到现在的大部头作品。有人说我的音乐都挺“主旋律”的,我觉得主旋律其实

见他在指挥台上站定,目光如炬,对着乐队的每一位演奏员扫视了一遍,仿佛再说:别担心,有我在,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他打出的节拍准确有力,提示到位无误,无可挑剔。未经排练的乐队像被施了魔法,将《罗马狂欢节》演奏得波澜起伏,对比鲜明,高潮迭起。演出获得了圆满成功。

柏辽兹的气场不言而喻。之所以如此,是他因为拥有作曲家和指挥家的双重天赋和才能。用中国人的俗语: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不过,金刚钻究竟是什么?有时还真难说清。

德国指挥巨匠富特文格勒即是一例。富特文格勒以精熟八极、心游万仞的浪漫主义指挥风格著称于世。一些长期在他手下工作的柏林爱乐的老演奏家私下里议论,每次音乐会开始前,当富特文格勒刚从休息室走向舞台,他们未闻其声却已分明感受到他那神秘的气场了。法国著名指挥家蒙都讲过一件事:有一次他客席指挥柏林爱乐演出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无论他怎样打拍子,第一乐章的开始总是做不到整齐划一,结果音乐会的效果不佳。后来富特文格勒率柏林爱乐来巴黎演出,曲目中也有“贝一”,于是蒙都去听了音乐会,他想着看看富特文格勒是如何处理这一难点的。富特文格勒的下拍仍然是他招牌似的让人难以看清的抖动,但乐队的演奏出奇地整齐饱满,灵动飞扬。

我曾有过两次现场感受音乐家气场的亲身体验。第一次是2003年的初春时节,著名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来沪演出,我去大剧院看了他与上海广播交响乐团演出的彩排——德沃夏克《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那天看彩排的人不多,因此我坐在前排可以得舞台看得清清楚楚。只见马友友步履轻捷洒脱地从后台走上舞台,笑嘻嘻地与指挥、乐队

首席打了招呼,没有一点架子。然而,当他坐定操琴,在乐队的序奏后深沉地拉出第一个乐句,一股温暖迷人的气氛顷刻间在大剧院内弥漫开来。随着音乐的展开,马友友的演奏时而激动狂热,时而优美如歌,但始终如磁铁一般紧紧地吸引乐队呼应着他,仿佛他不仅是独奏,还是真正掌控乐队的指挥。让我不得不赞叹:马友友的气场真是强大,对乐队有一种神奇的感召力。

另一次是前些年的一次音乐爱好者迎新联欢会上,一支业余乐队应邀前来助兴。说实话,水平实在不怎么样,感觉演奏得七零八落,像一辆老牛车,开得摇摇晃晃,随时随地都有散架的危险。那天,指挥家陈燮阳也来了。联欢会末尾,主持人热情地邀请他指挥乐队演奏一曲。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陈燮阳走上指挥台。他胸有成竹地挥棒击拍,刘天华《良宵》优美委婉的旋律响起。真是神了,刚才还是松散凌乱的乐队在他不慌不忙、手势明确有力的点拨下,面貌顿时焕然一新,声音变得有板有眼、整齐饱满。显然,陈燮阳的气场传递给了这支以前从未接触过的民间乐队,有如点石成金,引导着演奏顺利进行直至结束,也让全场欢乐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就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最值得关注、记录和讴歌的人和事,我想通过音乐这门世界语言向世界传递当下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我也在努力通过自己的创作改变一些同龄人对“主旋律”的刻板印象,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我回国后的第一部作品是第四交响曲《复兴》,这是一部以“中国梦”为大背景的作品。我天马行空地写了一个110分钟的初稿,上半部分是“环境之梦”,写的是我脑海中最理想的生活环境——无烟之城、绿水青山;下半部分是“精神之梦”,战胜了人性的弱点之后做真正的自己、问心无愧的自己。这都是我内心想要表达和抒发的,并不是被动的。

总的来说,在我心中,“上海之春”一直充满着青春和朝气。每年四五月,全国新作品、国际艺术友人汇聚一堂。让优秀节目与作品飞入寻常百姓家。希望它能不断为国内外知名与不知名的优秀青年艺术家打开分享硕果的大门,成为一个充满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国际音乐节。

多媒体艺术为舞台增添时代活力。



德国指挥巨匠富特文格勒即是一例。富特文格勒以精熟八极、心游万仞的浪漫主义指挥风格著称于世。一些长期在他手下工作的柏林爱乐的老演奏家私下里议论,每次音乐会开始前,当富特文格勒刚从休息室走向舞台,他们未闻其声却已分明感受到他那神秘的气场了。法国著名指挥家蒙都讲过一件事:有一次他客席指挥柏林爱乐演出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无论他怎样打拍子,第一乐章的开始总是做不到整齐划一,结果音乐会的效果不佳。后来富特文格勒率柏林爱乐来巴黎演出,曲目中也有“贝一”,于是蒙都去听了音乐会,他想着看看富特文格勒是如何处理这一难点的。富特文格勒的下拍仍然是他招牌似的让人难以看清的抖动,但乐队的演奏出奇地整齐饱满,灵动飞扬。

我曾有过两次现场感受音乐家气场的亲身体验。第一次是2003年的初春时节,著名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来沪演出,我去大剧院看了他与上海广播交响乐团演出的彩排——德沃夏克《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那天看彩排的人不多,因此我坐在前排可以得舞台看得清清楚楚。只见马友友步履轻捷洒脱地从后台走上舞台,笑嘻嘻地与指挥、乐队

就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最值得关注、记录和讴歌的人和事,我想通过音乐这门世界语言向世界传递当下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我也在努力通过自己的创作改变一些同龄人对“主旋律”的刻板印象,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我回国后的第一部作品是第四交响曲《复兴》,这是一部以“中国梦”为大背景的作品。我天马行空地写了一个110分钟的初稿,上半部分是“环境之梦”,写的是我脑海中最理想的生活环境——无烟之城、绿水青山;下半部分是“精神之梦”,战胜了人性的弱点之后做真正的自己、问心无愧的自己。这都是我内心想要表达和抒发的,并不是被动的。

总的来说,在我心中,“上海之春”一直充满着青春和朝气。每年四五月,全国新作品、国际艺术友人汇聚一堂。让优秀节目与作品飞入寻常百姓家。希望它能不断为国内外知名与不知名的优秀青年艺术家打开分享硕果的大门,成为一个充满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国际音乐节。

多媒体艺术为舞台增添时代活力。

就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最值得关注、记录和讴歌的人和事,我想通过音乐这门世界语言向世界传递当下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我也在努力通过自己的创作改变一些同龄人对“主旋律”的刻板印象,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我回国后的第一部作品是第四交响曲《复兴》,这是一部以“中国梦”为大背景的作品。我天马行空地写了一个110分钟的初稿,上半部分是“环境之梦”,写的是我脑海中最理想的生活环境——无烟之城、绿水青山;下半部分是“精神之梦”,战胜了人性的弱点之后做真正的自己、问心无愧的自己。这都是我内心想要表达和抒发的,并不是被动的。

总的来说,在我心中,“上海之春”一直充满着青春和朝气。每年四五月,全国新作品、国际艺术友人汇聚一堂。让优秀节目与作品飞入寻常百姓家。希望它能不断为国内外知名与不知名的优秀青年艺术家打开分享硕果的大门,成为一个充满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国际音乐节。

多媒体艺术为舞台增添时代活力。

就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最值得关注、记录和讴歌的人和事,我想通过音乐这门世界语言向世界传递当下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我也在努力通过自己的创作改变一些同龄人对“主旋律”的刻板印象,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我回国后的第一部作品是第四交响曲《复兴》,这是一部以“中国梦”为大背景的作品。我天马行空地写了一个110分钟的初稿,上半部分是“环境之梦”,写的是我脑海中最理想的生活环境——无烟之城、绿水青山;下半部分是“精神之梦”,战胜了人性的弱点之后做真正的自己、问心无愧的自己。这都是我内心想要表达和抒发的,并不是被动的。

总的来说,在我心中,“上海之春”一直充满着青春和朝气。每年四五月,全国新作品、国际艺术友人汇聚一堂。让优秀节目与作品飞入寻常百姓家。希望它能不断为国内外知名与不知名的优秀青年艺术家打开分享硕果的大门,成为一个充满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国际音乐节。

多媒体艺术为舞台增添时代活力。

「你争我夺」话竞争

桂乾元

